

在哈佛聽亨廷頓演講

● 木令耆

每一年在哈佛大學有美日關係講座會議。前一年在會上聽索羅(Lesten Thurow, 經濟學家, 當時是麻省理工學院工業管理學院的院長)演講, 論題是:「美國與日本工業管理之分別」; 當時他的新書(關於世界經濟競爭)待將出版, 並此時正逢美國經濟蕭條之際。索羅的分析縝密, 思想新穎, 邏輯嚴謹, 思維精清, 觀察敏銳, 思野曠達。他所作的研究, 在分析、比較、解釋、推理各方面的運籌思維令人驚服, 很顯明他有第一號頭腦。他的作風完全是MIT(麻省理工學院)方式, 與哈佛長春藤爬滿古屋的傳統學風完全是兩碼事。

今年的美日關係講座卻又回到塵埃古老的傳統。亨廷頓的文章是在93年春季讀到, 當時《紐約時報》曾經登載過不少反辯的長信, 我以為這種陳舊思想、過時的文化理論都經不住人類學、社會經濟學的考驗, 也將隨風

吹逝, 不料在十二月中哈佛的美日關係講座居然是亨廷頓來講。

英文裏有一名詞「恐龍」(dinosaur), 它是指被時代淘汰掉的龐然大物。它的龐巨影響它的生存, 因它龐大的笨拙, 不易改進, 適應不了新環境而追不上時代。「恐龍」既是名詞, 也是一看法觀念。

亨廷頓演講給人的印象便是「恐龍」了, 尤其是他的政治歷史觀。

其要點大致如下:

世界上文化衝突是幾乎不可避免的。因為世界的權勢平衡在更動, 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衝突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這更動的中心位於亞洲。亞洲國家之間也將發生戰爭, 由於發展速度的不同, 中國將是主要角色。在亞洲反華勢力將會出現。亨廷頓認為美國與日本的衝突是短暫的, 但與中國的衝突卻是長遠的, 因為日本的政治制度與西方制度越接近, 衝突便繼之減少。可是中國歷來便是帝國主

義，有擴大版圖的野心。尤其中國與伊斯蘭的「神聖聯盟」，將與西方國家敵對峙立。中國已經大量購買武器，正在將軍力現代化、自動化。

美國對華政策的方針有如下三點：(1)美國必須與日本關係拉緊，日本是美國勢力在遠東的據點；(2)美國也須試圖與越南發展正常關係，支援越南的經濟發展，因此越南也將成為美國軍事據點；(3)美國將向俄羅斯施加壓力，禁止俄國販賣技術，尤其是核子武器等高技術給中國。

他的結論是美國必須圍困中國(containment of China)。

聽到亨廷頓說到俄羅斯，我禁不住一笑，因為我剛從俄羅斯回美，在俄國，人民的反美情緒高昂。他們多將俄國面臨的飢荒窮困歸罪西方的經濟改革藍圖，和西方的傀儡葉爾新，對葉爾新的理解是：他是一酒鬼傀儡。這是俄國人民的情緒。

據我北歐之行的觀察，美國如想控制俄國是極其困難的，尤其現在俄國整個國家癱瘓，陷於黑社會與無政府狀態。

俄國是世界政治的未知素，由這次的大選已可證明。美國卻天真地認為它的對敵俄國已經瓦解，冷戰的戰士亨廷頓已失去他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如果亨廷頓要維持與華盛頓政府的關係，就必須另外找出對象，因為有冷戰才有冷戰戰士的必要勢力，而中國便是他找到的新敵人。

聽完他的演講，我與來自日本和南韓的訪問學者們交換意見，都不約而同的搖頭冷嘲亨廷頓的十九世紀「白人負擔」的思想。(吉甫林所謂的

white man's burden.)

哀哉哈佛！亨廷頓有終身職教授之位置，哈佛只能由他作狂言謬論，在哈佛的其他教授也無法對付他那已經衰退的腦力活動與冷戰神經質的發言。

每一個學府都有「恐龍」之亂。哈佛的老牌名聲大，只有為亨廷頓助威。這便是為甚麼哀哉哈佛！

我與另一哈佛教授開玩笑說：「我看第三次大戰爆發後，我去集中營的日子不遠了。」他忙堅持回答：「亨廷頓是過時的冷戰戰士，美國決不會與中國作戰。」

我在歐洲，從莫斯科至倫敦各城市，發現店舖內所擺置的商品許多是標明中國製造。在瑞典時又被邀去聽歌劇，因為新歌劇的作曲者是來自中國的瞿小松，歌劇是：《依笛柏斯之死》(Oedipus The King)，一古典希臘悲劇。

世界上甚麼是西方文化，甚麼是東方文化，此界線早已崩潰，現今後現代文化早已走向文化的自然選擇運用方式，或折衷主義(eclecticism)。跨國公司與跨國市場早已促進這種趨勢。

我從活生生的世界性的各國社會中返回哈佛校園，聽到亨廷頓的演講，只感到一種知識性的退步(intellectual regression)。更加覺得在政治系和某一些社會學方面，如果一個教授只是一味生活在象牙塔中，一個學府常會變為文化沉澱的博物館。「恐龍」現象的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研究學問是追求知識，那麼「恐龍現象」便是一大絆腳石。